

● 环球随笔

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

[法] 陈力川

如果有一座城市，你越走近它，越觉得它不可企及，那么对我来说，这座城市就是圣彼得堡。这个由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孕育，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世界上最抽象最有预谋的城市”有太多让你动心的地方。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是1990年8月的一天，那时这个城市还叫列宁格勒。从机场搭计程车进城，我没有立即去旅馆，而是迫不及待地到城里兜了一圈。我喜欢那种不刻意寻找什么，却充满不期然发现的感觉。计程车司机把我带到坐落在十二月党人广场的彼得大帝雕像前，普希金曾借这个法国雕塑家法尔高奈（Falconet）用十年时间铸成的《青铜骑士》赞美圣彼得堡：“我爱你，彼得的创造，/我爱你严峻的和谐，/涅瓦河的湍流，/还有河岸的花岗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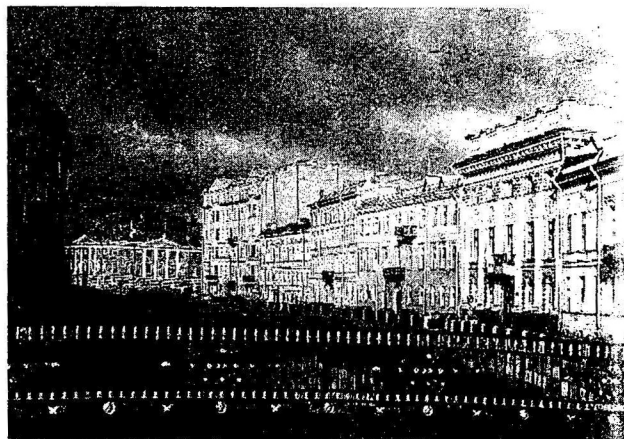


十七岁执政的沙皇彼得大帝像

穿过皇宫桥，来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顶端的普希金广场，向涅瓦河对面冬宫的方向遥望，圣彼得堡平躺在你的面前，没有高楼大厦，所有建筑的高度都与冬宫相仿，绝不超过教堂的圆顶和尖顶。人住的房子不能高过上帝之所，沙皇的宫殿亦如此，这是人对神起码的尊敬。仅从楼房的高度就可以窥见过去的人比现在的人敬神畏神。同一年我去柏林，看到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炸毁的教堂残垣被周围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场的高楼淹没，新旧对比好像



法尔高奈用十年时间创作的彼得大帝雕像



“所有建筑的高度都与冬宫相仿。”

提醒人们今天的消费社会已经改变了信仰（前年回哈尔滨探亲，看到当年白俄建造的索菲亚教堂虽然被修复一新，但四周的高楼如异军突起，那情形好似猴子骑在大象的脖子上）。除了平旷，圣彼得堡还是一个彩色的城市，建筑的颜色红白蓝绿黄都有。在那漫长和寒冷的冬季，这些五颜六色的建筑在阳光和白雪的映照下可为人们带来些许慰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所描述：“我喜欢彼得堡三月的太阳，尤其是天

气清冷时的落日。一时间,整个街道被照得通亮,沐浴在鲜艳的光泽之中。所有的房子骤然间闪闪发光,……好像灵魂闪耀着光芒。”

“我爸爸听说你从巴黎来,他想见见你。”第二天开完会,玛莎轻轻地对我说。

玛莎是我们的法语翻译。他的父亲是列宁格勒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早年曾留学法国。

“你爸爸喜欢喝法国酒吗?”

“喜欢。”

“列宁格勒什么地方能买到法国酒?”

“白桦树。”

玛莎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回答问题总是三言两语,我不明白她怎么当上职业翻译的。她说的“白桦树”(berioza)其实是一家外汇商店,当时只收美元、马克和瑞士法郎。

“自从我小时候看到列宾画的白桦树,就一直把它当成俄罗斯的象征,现在‘白桦树’怎么成了外汇商店的名字?”我不解地问道。

“列宾活在十九世纪,现在俄罗斯的象征是美元。”我没想到玛莎说的第一个长句子就这么尖刻,如果她问我现在中国的象征还是龙吗?我应当怎么回答她呢?

我们坐有轨电车来到玛莎的父亲家。一路上经过的街道让我想起童年的哈尔滨。街道不宽也不窄,两侧楼房的高度和街道的宽度大致相当,这是一种最让人感到舒服的比例。大部分楼房都有一个院子,两座楼后面的院落相连,穿过去不是一条街就是一条小河。我想起在莫斯科,每看到一座斯大林时代的高大建筑物或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加里宁大道上,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钻进旁边的一条小街,寻找旧俄罗斯的荫庇,那心情恰似在烈日的灼烤下寻找荫凉。

玛莎父亲住的是一所又老又旧的房子,老旧得让人感到亲切。树枝懒洋洋地垂到凸凹不平的地上,像一扇绿色的屏风遮住院子

的一面高墙。楼梯走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您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索洛维瓦先生的法语仍然算得上流利,只是带有明显的俄国口音。

“哈尔滨。”我回答说,“列宁格勒很像哈尔滨。”我不假思索地补充了一句。

索洛维瓦先生的脸上好象掠过一丝不快,接着是长久的沉默……由于是初次见面,我将这种沉默归咎于俄国人忧郁的性格。

玛莎端上来一盘面包,黄油,还有腌酸黄瓜。看着我带来的一瓶法国红酒,一瓶威士忌,索洛维瓦先生说他已经有很多年没喝这两种酒了。几杯酒下肚,我们都不像开始时那么拘束了。

“我想我还是应该纠正您的话。您刚才说列宁格勒很像哈尔滨。我没去过哈尔滨,不过如果这两个城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也只能说哈尔滨像列宁格勒吧!”索洛维瓦先生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很严厉。

其实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了他刚才脸上不快的原因。我向他表示歉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问我列宁格勒什么地方让我想起哈尔滨。

“小时候走在哈尔滨的街道上,看到那些俄式建筑,我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寂。在列宁格勒,这种孤寂感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或许因为哈尔滨受俄罗斯的影响显得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所以我觉得哈尔滨在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

听了我的回答,索洛维瓦先生沉思了一会儿才说道:“这么说,哈尔滨和列宁格勒还真有点儿像。您知道列宁格勒原来有很多名字,圣彼得斯伯克,圣彼得堡,彼得格勒等等。它是一个世纪之间,历代沙皇聘请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所以对俄国人来说,它是一个欧洲城市,但对欧洲人来说,它是沙皇俄国的都城。果戈理曾说:圣彼得堡是‘自己祖国当中的异乡人’,可见它在俄罗斯也是一个孤独的城市。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一样,不为外人了解和认同,还不能算是完全孤独;只有当他不为自己了解和认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孤独呵。”

我第二次去圣彼得堡是1995年的夏天。这一次是从斯德哥尔摩乘轮船经过波罗的海到达圣彼得堡的。结束了下午的参访活动后我给玛莎打电话。

“我想去看看你父亲,这次不用去‘白桦树’了,我在船上给他买了两瓶法国红酒。”我想玛莎听了一定会高兴。

“看他可以,但酒不能给他。”

“为什么?”

“他已经变成酒鬼了,课都不能上了。”

“可我不想空手去看你父亲呵。”

“那你就买两瓶橘子汁。”

这最后一句话,玛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的,我只好照办。果然,玛莎到了她父亲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桌子上剩下的半瓶伏特加酒倒进了厕所。

五年不见,索洛维瓦先生的变化的确很大,头发几乎全白了,神情显得更加忧郁,见到我没有露出我期待的激动,只是微微地点头。

“哈尔滨还像列宁格勒吗?”他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谈话。

“越来越不像了。”我遗憾地回答。

“为什么?”他有点儿不解地问。

“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误解了现代化,以为现代化就是建高楼大厦,把躺着的城市竖起来。”

“但愿列宁格勒人有钱可别这么干?”他好像有点儿担心地说。

“上帝保佑,你们千万别把矮房子拆了盖高楼!”我也担心起来。

我注意到他还说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人,想起上次见面时他纠正我的话,就以玩笑的口气纠正他说:

“您现在应该问:‘哈尔滨还像圣彼得堡吗?’你们的城市不是已经改回了原来的名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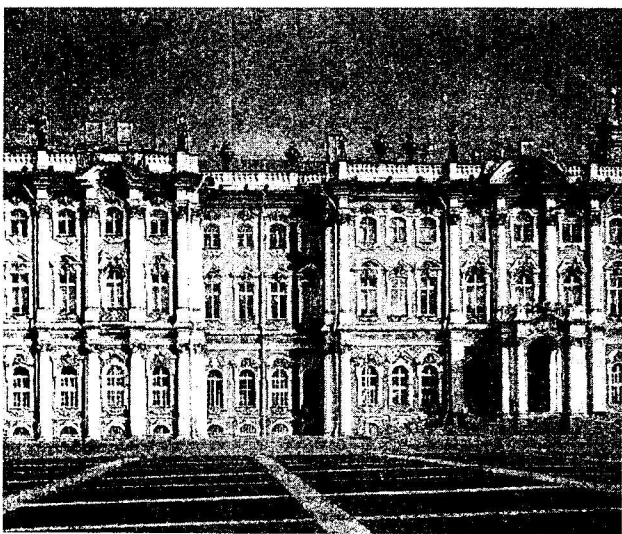
索洛维瓦先生的脸上又掠过一丝不快,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我知道我说的话一定又出了什么毛病,没等他沉默多久,便追问其中的原因。

1918年3月12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将首都从当时的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1924年列宁去世后,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列宁不仅使这个城市免遭了成为苏联首都的耻辱,而且还使她免于被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建造的那些笨拙沉重的高楼大厦毁容。就为这一点,我们的城市也应该纪念他,保留列宁格勒这个名字。”

看来,索洛维瓦先生希望保留列宁格勒这个名字是感念列宁没有定都彼得格勒。可我觉得列宁格勒还是恢复圣彼得堡更好,因为除了十月革命,列宁与圣彼得堡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可能还是仇恨(列宁的大哥亚历山大因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而在圣彼得堡被处以绞刑);相反彼得大帝的身影却随处可见,这个城市尚未诞生就已经在彼得大帝的想象中存在过,它是一个真正被设计出来的城市,一个按照彼得大帝的构想打造的“乌托邦”。这个城市改名列宁格勒以后近七十年的历史记录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由盛至衰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斯大林发动的肃反使列宁格勒这个被纳粹军队围攻了九百天而没有陷落的城市顷刻间瓦解,历史上俄罗斯思想文化摇篮的地位毁于一旦,许多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遭到整肃、批判、流放。1946年,杰出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在列宁格勒被作为“颓废”、“反动”的代表人物接受批判,她的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Nicolai Goumilev)于1921年被枪决,儿子列夫·古



苏维埃大厦前的列宁雕像



冬宫一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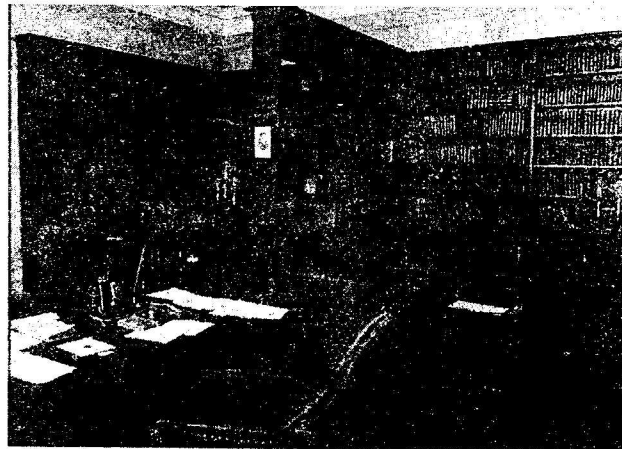
米廖夫(Lev Goumilev)也曾遭逮捕。阿赫玛托娃死后二十年才发表的长诗《安魂曲》，如今被看作斯大林恐怖时代受害者的文字纪念碑。另一个遭受迫害的著名诗人是阿赫玛托娃的学生，1940年出生在列宁格勒的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他二十四岁那年被勃列日涅夫当局判处五年劳改，罪名竟是“社会寄生虫”，其实他十五岁退学后，为了谋生先后做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是一个标准的劳动者。1972年他被驱逐出境，遂流亡美国，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索洛维瓦先生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列宁格勒这个名字的原因。但我要告诉你，真正伴随圣彼得堡人度过这七十年艰难岁月的，不是彼得大帝辉煌的历史传说，也不是这个集中了欧洲建筑、雕塑和园林艺术之美的城市，而是俄罗斯的语言。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阿赫玛托娃，布洛克(Alexandre Blok)陪我们熬过了列宁格勒的寒冬。”说着，索洛维瓦先生拿出一本破旧的小书，他用俄语念了一段，然后让玛莎翻译给我听，其大意是：

“在怀疑的时刻，当昏暗渺茫，我叩问祖国的命运。你是我唯

一的慰藉，我唯一的依靠，啊，俄罗斯语言，你伟大、强烈、自由而纯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能不为自己的遭遇深感绝望？我无法相信这样一种语言不是被赋予一个伟大的人民。”

索洛维瓦先生说这是屠格涅夫写于1882年的散文诗。我告诉他下午我在普希金故居看到一撮鬃发，据说是屠格涅夫从决斗死去的普希金头上剪下来的，当时屠格涅夫只有十九岁，他一生始终把这撮鬃发带在身上。



普希金故居图书馆

索洛维瓦先生接着说，普希金生前因自由派思想多次受到沙皇政府的制裁，但他深受俄国人民的爱戴，当局又奈何他不得。普希金决斗身亡，沙皇政府幸灾乐祸，肆意压低葬礼的规模，拒斥民众参加。葬礼前几天，去普希金故居悼念的民众络绎不绝。普希金的朋友，诗人维雅杰姆斯基(Viazemski)看到一个老人泪流满面，他问老人是不是普希金的亲属。老人回答说：“不是，但我是俄国人。”可见普希金的语言不仅对俄国作家和诗人的影响很大，而且深入到俄国人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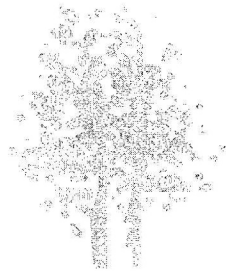
告别前，我趁玛莎去厨房洗杯子的时候，从书包里轻轻拿出那两瓶红酒，索洛维瓦先生会意一笑，将酒接过去藏到了床下。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喝酒，但我是带着几分醉意离开索洛维瓦先生家的。回客轮的路上，我绕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普希金广场，面对涅瓦

河的“铁流”朝冬宫的方向遥望，“夜有梦而无月，它的黑暗格外明亮”^①。



瓦西里耶夫斯基岛鸟瞰

2003年10月于巴黎



^① 引自普希金,《青铜骑士》。